

不滅的烙記—— 張大邦的二二八、白色恐怖記憶（上）

文／圖 張大邦

我的家境：住臺南第一棟洋樓

我是1929年日據時代出生，曾是日本籍，家境不錯。我在1936年讀小學一年級時，住在臺南市第一棟西式的樓仔厝。¹家父漢文底子好，他在臺南市是出名的代書，能以流暢的中文幫人家寫陳情書和訴願書，早上三、四點就起來把手稿寫好，等到我六、七點起床後，再由我幫他「清書」²，他誇獎我說兄弟裡就屬我寫的字最漂亮。而父親的履歷書現仍留存於世，他的毛筆字寫得更漂亮。由於他臺、中、日文皆通曉，沒有語言隔閡的限制，我的漢文也在無形中從他那裡學了不少。家中有六個孩子，三個男生、三個女生。哥哥大我三歲，弟弟小我三歲。哥哥國小前五年都讀第一名，到六年級快畢業時，爸爸把他送到日本神戶唸工業學校，畢業後他在準備上高等學校時，爸爸看到日本戰況不對，就安排他去

中國；在終戰前二年，爸爸預見日本快敗了，在臺灣也難以謀生，就先把全家人疏散到鄉間，之後先行去日本，接著去上海，當「全國粉麥統制委員會」的翻譯；³終戰後，搭乘頭一班帆船回來，並在他的安排之下，讓哥哥在上海的「川崎造船廠」⁴就業；因此，



圖1 1937年筆者（左一）8歲時，與父母（二排中、右）和兄弟姊妹在臺南市南門町三丁目32番地家裡中庭的全家福照。後立者為20歲大姊。（張大邦提供）

1 原臺南市南門町三丁目32番地，現在改為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115巷12號。

2 謄寫校對。

3 1943年5月19日，汪精衛政權於上海成立「粉麥專業委員會」，負責收購分配小麥與粉麥，並於1944年6月改組為「粉麥統制委員會」。

4 日本人曾在那裡修理戰艦。

1945年廣島被原子彈轟炸時，哥哥幸運逃過一劫，我非常佩服爸爸的先見之明。

當我1950年入獄之後，弟弟才上大學的年紀，他非常用功讀書，臺大、成大都榜上有名。那時因為經濟不好，家人不讓他出遠門讀書，而爸爸得負擔全家的生計，我又被抓去，他只好就近讀成大機械系。他曾拿過兩個獎學金：一個是臺泥的、另一個則是唐榮的，他的學費就全靠這兩個獎學金。畢業後他通過留學考試、出國讀書，那時他已經結婚了。到了美國第二年還是第三年，妻子和兒女三個都移民到美國居住。後來，妻子在美國去世；他沒喝酒，也沒抽菸，很愛乾淨，在美國一間很大的公司當主管。而移民工作須加倍賣力，生活中還得培養三個孩子，且一女二男皆在有名的常春藤大學就讀，在生活及精神壓力極大的狀況下，導致細胞突變，不幸罹患肺癌去世。

南師附小：成績優，拿獎狀

我從小受日本教育，國小讀「臺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」⁵，那是為了培養日本小學老師而附設的學校，有師範生來這裡實習教學。當時有一些同學因為家境不好穿木屐或運動鞋，甚至赤腳上學（有的到學校時才穿上木屐，下課後就脫下木屐赤腳走回家）。也有些學生在家放牛，有時候沒來上學，還要勞動老師去訪問他家，請他繼續來上課。

我小學的成績還不錯，二年級還是三年級就參加「國語演講比賽」，在禮堂上用日語向全校師生演講。幾乎每一年都拿獎狀，獎狀現在還保存著，還曾被老師選做副班長。1937年讀二年級時，中日戰爭開始，1941年讀六年級時，發生珍珠港事件。⁶

小學畢業旅行，要從基隆坐船到臺南，但因家境沒落，全班只有我沒有參加，日本籍的老師還親自到家裡勸父親讓我去，費用由老師來籌措，這件事情直到現在還令我難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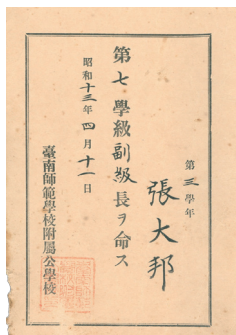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張大邦就讀臺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擔任副級長證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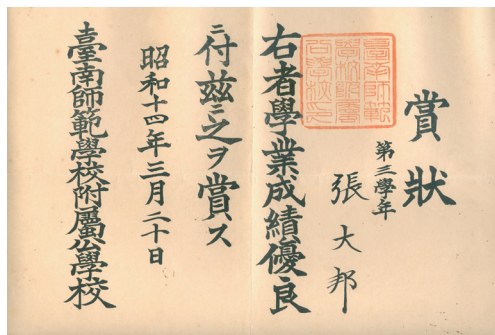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張大邦在臺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的賞狀

⁵ 臺南師範附小。

⁶ 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帝國軍隊攻擊美國夏威夷珍珠港。

南工：被「日本狗仔」欺負的歲月

畢業後考上「臺南工業學校」⁷，那時考南工比現在考南一中（當時叫南二中）還熱門，兩千多人應考，五個科總共錄取200人，一科一班，每班平均50個學生。我是第二期生，那時臺灣人不超過50個，因都優先錄取完日本人後，才錄取幾個臺灣人陪襯，第一期的臺灣人更少。那時的日本人不是很喜歡讀書的，也可以進南工，但臺灣人功課必須相當好、家境也不錯，才能被錄取。

南工比雄工⁸早一年設立，當時臺灣的工業學校只有臺北工業、臺中工業和臺南工業三校。那時學生要升學，不選中學而選工業學校的很多，因為戰時需要技術人才，工業學校的畢業生比中學畢業生的待遇來得高。我記得當時的月薪是50幾元，中學畢業只有30幾元。當時我爸爸替我選擇建築科，屬於自然科學的應用科學。⁹我的課業在班上名列前茅，體育也不錯。一、二年級時，每學年要跑一萬公尺，從永康跑到臺南運河再跑回來，我從不落隊。考上南工時，其中一項是吊單槓，我才吊12下，老師就說：「好了，你可以下來了。」

由於我小學畢業就進南工，因有些人要續讀二年高等科，¹⁰我不知道幸或不幸，在班上年紀比較輕，比人家小二、三歲，又長得瘦小，身高在全班是倒數第二或第三，被人家當作出氣筒。南工的日本老師和同學都輕視臺灣人，且當時的日本教育是軍國主義、斯巴達式的作風，體罰、跑步更不在話下。

同學間更不必說了，日本人欺負臺灣人是家常便飯，不僅挨同學的揍，也挨日本人學弟的揍；像我讀到三年級時，二年級的日本人學生照樣欺負你，叫你站在水溝底，好讓他站在上面方便打你。那時我們叫日本人「狗仔」，臺灣人就這樣被「狗仔」揍來揍去，當時，爸爸雖然曾到校向軍事教官訴苦，他們還是照樣欺負你。

日本人欺負臺灣人並不稀罕，到了戰後，有些蠻橫的日本老師就被學生報復，拳打腳踢一頓了。像一位教劍道五段的老師，平時就這樣欺負臺灣學生，用竹劍直接往腦門敲下去，當場幾乎昏倒，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就是「清國奴」，其實他是指桑罵槐。當

7 全名為「臺南州立臺南工業學校」，創建於1941年，校址位於永康。1945年終戰後改名為「臺灣省立臺南工業職業學校」，1951年奉令改稱「臺灣省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」，2000年再次更名為「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」。

8 高雄工業學校建於1942年，1979年改名為「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」。

9 應用科學分為機械、電氣、化學、土木、建築五科。

10 當時的日本小學學制是六年制加高等科二年，任人選擇，六年畢業也可以。

時的我不解其意，直到看到正在上演的熱門戲，難得一見這批逃難來臺的「清國奴」本來的真面目，自我表露得淋漓盡致，和柏楊所寫的《醜陋的中國人》一書相比真是「百聞不如一見」。歷史說「人是比禽獸更可怕的動物」，才知他要罵的對象是那一種人，戰後就有臺灣學生回揍他一頓。

終戰前後（一）：南工的學徒兵

戰爭期間物資很缺乏，實施糧食配給。我讀小學時就已經實施配給制了，如果改日本姓名，就配給得好一點。家裡有七、八個人要吃飯，爸爸爲了三餐，也只好全家改姓名了（皇民化運動）。小學唸到二年級，因家父事業失敗，遭日本人拍賣，從此過著窮苦的日子，租屋移住到清水町。

在南工讀到三年級後（1944年）我們就被動員了，要建設飛機場、飛機掩體和橋樑等，¹¹以備萬一盟軍登陸時應戰。當時還可以一邊做一邊讀書，但是，當工兵隊的工作勞累再加上戰時物資匱乏，正值成長期的我更因營養不良，加上休息不足，染上了肺炎。請病假時，日本人的級任老師飯田先生，親自從臺南市騎腳踏車到安南區，來回四個小時，爲的是苦口婆心地說服我母親；那時，母親聽不懂日文，由我來轉達：「目前戰況到此地步，情勢不妙，索性休學對孩子比較好」。但由於我的好勝心強，擅自做決定不休學，繼續上課，但飯田老師的一番好意令我終身難忘。

南工本來是五年制，終戰前一年，日本戰況不利，開始徵兵，因應戰時體制，把學制縮短爲四年。我讀到四年級時（1945年），日本部隊從中國東北調往東南亞，但戰局變化太快，就地防衛臺灣。當時有士無兵，就拉我們這些受過軍事教育的學生當兵，由日本的軍官帶隊，老師隨行，去臺南仁德機場挖飛機的掩體。後來同學分散，有的被派到關廟、龍崎挑石頭、造橋等工程。我被派到高雄縣龜洞當工兵，晚上睡在國小教室的水泥地上，上面鋪著一層稻草，裡頭藏有無數的跳蚤，醒過來才發覺滿身紅腫。有一天，日本軍官帶我們同學往山邊方向走去，當他發現一隻野狗，馬上就朝牠開了一槍，叫同學們將野狗扛回去。日本軍官馬上用軍刀將野狗開刀處理，同時下了一道禁口令，不准對外聲揚；這種情況將近一年，所以我四年級時就很少讀書。

在軍隊裡很可憐，軍隊用的飯盒上下兩層，盒子上層較淺的一層用來放菜，下層

11 在竹林中做為飛機的藏匿處，避免敵軍由空中俯瞰被發現。

則裝飯。下層的飯裝不到三分之一，上層的菜是空心菜灑一點鹽，有一次夾雜著一條蚯蚓，嚇了我一跳，沒什麼營養可言。當時的我們胃口正大，這種飯盒根本不夠吃，餓得要死；有一天，同學發現一棟木造房子裡藏有一堆罐頭，我們爭先恐後搶著偷回來，卻被管倉庫的人發現了，於是把我們召集排成一隊，拳打腳踢一頓，直到湊足失去的罐頭數目；另外一件事，是一個同班同學，家裡做魚塢的，家離部隊不遠。有一天，兩人一同偷溜回去補充點營養，剛好在點名時，人卻沒到。結果被教官查到後痛打一頓，再叫同學圍毆，我們被打得鼻青臉腫，趁機連滾帶爬閃入防空洞裡，那段期間真是苦難的日子。

終戰前大約半年，B-29開始轟炸，有些同學來不及藏匿，就近躲到營舍——臺南一中校舍外附近；那時，有個同學來不及跑到竹林，只好躲進附近的防空壕，那個防空壕沒有掩蓋，差不多五、六尺長，深約四尺，寬約兩尺，人可以跑進去，炸彈炸到邊沿上，他正好躲在這裡，靠近壕溝旁邊的人，整個被土掩蓋卻沒死，但是另一個在對角的同學卻被炸死了。那晚我們槍拿倒反，通宵守夜，小孩子從來沒見過死人嚇得要命。我也曾跑到較遠的、現在已改為成大校園附近的一片竹林裡，躲進小洞裡僥倖沒死。

美軍轟炸之前半年，也就是終戰前一年，爸爸眼看日本快要敗了，就把家人從臺南市疏散到鄉下安順，就是現在的安南區和順寮。媽媽一直嘮叨：「好好的都市不住，卻要到鄉下沒有自來水，又給蚊子叮。」因為那時沒人在疏散，爸爸又即將要出國，只好先把一家人送到我二姐的宿舍住，當時二姐在臺南市安順國小當老師。差不多半年後美機便開始轟炸了，首先投下五百公斤重的大炸彈，再丟下燒夷彈，接著P-38戰鬥機低空用機關槍掃射。從轟炸那晚開始，臺南市往佳里、麻豆的馬路上，牛車一臺接一臺，大人帶著小孩和行李坐在上面，三天三夜一路沒有間斷過；臺南市內幾乎被炸平，我如果還在市內，可能早就被炸死了，那時才察覺到爸爸的判斷正確。

疏散到安順時，我讀南工三年級，每天騎腳踏車載著就讀師範附小的弟弟去上學。我們先從安順騎到臺南市公園路口，他下車走到學校，我再繼續騎到永康，前後花上一個鐘頭以上；那時如果是市內生，不准在市區騎腳踏車；因為我是從臺南縣來的，才准騎腳踏車上學。那時騎的腳踏車是no pump，沒有內胎，整條輪胎硬邦邦、不好騎。雖然家境不好，但家父知道小孩子受教育很重要，仍然堅持讓我們去上學、培育我們。

終戰前後（二）：敗逃來臺灣的中國乞食兵

終戰以前，隨二姐轉校到仁德國校宿舍後，再到臺南南工復學，那時來了一個代理校長，¹²還有一些中國來的老師，穿著長衫和包仔鞋，他們講的話我都「鴨仔聽雷」，因

此學華語、中文和臺語，成了我戰後不可或缺的、且需要急修的功課。日本時代不准講臺語，如講臺語有些學生會跟老師報告，讓你被處罰。在家裡雖然講臺語，但在學校待的時間比較久，回家只會講幾句簡單的日常對話，到學校則專心學日語，所以中文不大好；1946年3月，我在南工就讀完四年順利畢業，當時我18歲。雖然已畢業，但是校方並未馬上給我畢業證書，隔了好長一段日子，才發一張用十行紙書寫的畢業證明，而且薄得不像樣、敷衍了事。

終戰後，我們很高興，「以為臺灣光復了！可以回到祖國的懷抱了！」。中國老師對全校師生說：「祖國為了解放被奴役的臺灣同胞，在八年抗戰中犧牲了許多生命和財產，大家現在就去迎接國軍的來到。」在臺南火車站，到現在的「湯德章紀念公園」¹²迎接「國軍」到來。我們人人手拿一支旗子，站了好久，等了兩、三個鐘頭。直到後來遇到有一班車的乘客下來問我們：「你們站在這裡是幹什麼的？」「我們等國軍啊！」「哎，那老早就走過去了。」我們想了一陣子才發現，剛才拿扁擔的、扛鍋的、拿雨傘的、穿灰色棉襖、草鞋的、有的打赤腳、三三兩兩不像隊伍的那群人，就是「國軍」。戰爭期間，日本同學調侃中國兵，有一句押韻的順口溜，意思是說「支那兵，不會打仗，兩隻腳長得長、跑得快，那個東西（陰莖）長。」

日本人入侵中國，勢如破竹，我們經常被動員上街遊行慶祝勝利。日本軍隊有規律又很威嚴，反觀中國兵狼狽萬分，身穿灰色的棉襖軍服，根本沒什麼裝備，也談不上軍隊的樣子，難怪他們會這麼講。後來日本人要被遣返日本，搖頭感嘆：「唉！我們怎麼會打輸給這種軍隊呢？」

終戰之後初期，二二八還沒發生之前，我剛畢業還沒拿到畢業證明書。因家道中落，父親只是個書生，從上海寄回臺灣的錢，全被凍結在臺灣銀行，限額提領，一家七、八口不夠用。再加上當時國共內戰，臺灣物資被搬光，物價一日三市，後來四萬元換一元新臺幣；¹⁴因為爸爸之前在大陸當翻譯，認識一些中國人，透過他的介紹，不得已叫我去當中國兵仔。軍隊營址在臺南市公園路那邊，當時有許多日本宿舍，比較好的宿舍全都被中



圖4 1946年3月張大邦自臺南工業職業學校畢業的證明書

12 根據臺南高工校史，此代理校長為林全興。

13 當時叫大正町，現在叫中山路。

14 1949年6月15日，臺灣銀行發行新臺幣，舊臺幣四萬元換新臺幣一元。

國兵所占，中國兵穿著鞋子踩在榻榻米上，公然搬進去住，宿舍就變成了營舍。

我離開的原因，是因為在部隊中既沒有職位也無名號，只穿私服，當初說是要我去管文書，實際上進去部隊後並沒有辦公。早上上班就有早餐，中午也有得吃，晚餐吃完之後就可以回家休息了，有機會可以填飽肚子過日子而已。像我這類的例子很特殊，是因為我父親之前曾去過大陸，才有機會安插進去，但也是只有短暫時間，這就是中國社會所謂的「靠關係」。

接下來，再經由台電的臺南分公司經理陳訓煊介紹我跟臺南市長卓高瑄見面。他們都是福州同鄉，陳經理為我寫了一張十行紙的介紹信，卓市長看了後馬上叫建設局長來，說：「這個人你安插一下」。局長吩咐陳工商課長¹⁵說：「這人按月支薪，在建設局工作」。本來沒有名額、也沒預算，臨時把我安插進去；我是讀建築的，所以凡是從臺南市的安南區的土城國小到鹽埕區的鹽埕國小，只要是市政府管轄下的公有建築物，都歸我管，包括擔任第三屆省運臺南市體育場監工及總幹事、孔子廟修復工程、公家機關、市立中小學校及公共建設。因此全市市立學校校長都認識我，全市營造廠老闆，每次都要來聽我投標前的工地說明。

二二八：血淋淋的見聞

終戰沒多久，二二八就發生了，國軍從基隆殺到高雄，究竟殺了多少人無從統計，這是「祖國」送給臺灣親愛的「同胞」血淋淋的「見面禮」。臺灣人受五十年日本教育，不認識中國社會，只知道祖先從那邊過來，也不知道那邊是什麼情況，結果菁英大都被他們殺光，包括我的英文老師林茂生¹⁶，迄今不知屍體的下落。凡是在社會上有名望、有學術地位的，全都不見了，臺灣人好像牛頭被斬首了，任人擺布。外來統治者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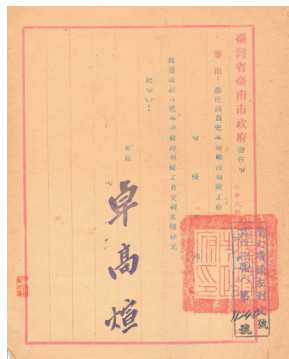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張大邦任職臺南市政府建設局的委任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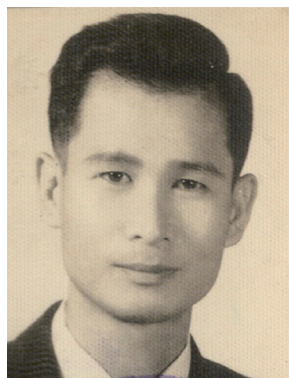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坐牢前在臺南市政府建設局任職照片。（張大邦提供）

15 工商課那時接收日本的營造廠。

16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。

到戰利品，起先叫做「日產」，後來日本人留下來的公私財產，也一律叫做「日產」，並成立臺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，由連震東（連戰之父）擔任主管。後來，「日產」竟成為中國國民黨黨產，他因此被提拔升官成為內政部長。中國國民黨頭子蔣介石當年奉美國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命令，接受日軍駐中國總司令岡山寧次投降時，令其不可向中國共產黨繳械。日軍遵令抗拒共軍，故日軍沒遭到屠殺命運的都平安被遣回日本。中國在八年抗戰中，損失慘重，無從統計，而南京大屠殺卻被一筆勾銷。蔣介石說「以德報怨」，臺灣人民因為無知，連社會菁英、賢達都遭到屠殺。蔣家要建立王國、消滅異己，將已現代化的臺灣劫收為戰利品，臺灣人付出至今不易翻身的慘重代價。從中國近代歷史，威權的真面目是「槍桿子出政權」，真正公義在哪裡？社會有影響力、有名望的知識分子都受害了，社會茫然無所適從。近幾年來，成為社會話題的追討黨產問題，像「馬戲團變魔術」，據財訊雜誌曾經統計過，總共「六千億的黨產」。2008年，國民黨以六三三為口號，騙到七百六十多萬選票，現在卻忽然說黨產已全部處理完畢？歸零。

二二八時我住在臺南，目睹過幾個場景。其中之一是在市政府的門口，市長的轎車，剛駛進來看到一個阿兵哥跑過來向市長哭訴。卓高瑄當下聽完之後，就和一群外省人慌慌張張地跑出去，那個場面我有看到；後來才知道這個阿兵哥被打的原因：原來他們去市場採買，東西拿了後，錢隨便一丟就走人，半買半搶的作風讓攤販無可奈何。平常忍氣吞聲的，但到了二二八，情況就不一樣，一肚子的怨氣頓時發洩出來，才會造成衝突事件；另一個場景是看到一些戰後從日本軍隊退伍的軍人，有的從南洋回來，也有從中國回來的，他們手拿軍刀、穿軍裝，往臺南機場方向分路行進，這個場面我也曾看到過；還有一個場面極為淒慘，在現在的大正公園¹⁷裡面，有棵羅望子樹，¹⁸這一棵樹現今仍在原址，湯德章¹⁹就倒在樹下，背後插一支牌子，現場被槍決，²⁰死狀淒慘曝屍，沒

17 「大正公園」為日治時代的稱呼，後來改名為「民生綠園」，即今日之「湯德章紀念公園」。

18 羅望子樹「*Tamarindus indica*」（即「印度熟棗」之意），別名羅望子、酸豆、酸角、酸果樹，原產地為非洲，日治時代輸入臺灣，除了是南部可見的行道樹之外，其成份亦可用以製藥。羅望子樹的果肉可以生食，也可製成果醬、蜜餞和酸子糖食用。

19 湯德章（1907～1946），父親為日人警官，於「噍吧哖事件」中遇害身亡，母親湯玉則為臺南南化人。湯德章早年曾任「臺南警察署」巡查之職，後赴日留學並通過高等文官司法考試，回臺擔任律師。在臺南地區相當知名的他，被推為「臺南區區長」，除了曾為「臺灣省參議會」候補參議員，以及「臺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」主委，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更出任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臺南分會」治安組長，協助維持地方治安。21師抵達臺南後，因勾結暴徒、擾亂治安、搶劫軍用槍械等名義被補，堅持不交出組織名單的他，除了被嚴刑拷打之外，甚至遊街處決後還公開曝屍不得收葬，以收殺雞儆猴之效，他從容赴義，無所畏懼，至今仍令人感念甚深。

20 湯德章為當時的臺南市長卓高瑄所下令槍決。

有人敢接近。湯德章人被捆綁、遊街示眾，背部插上一塊木板上寫「湯川德章」²¹。他是日本留學歸來的律師，在社會很有名望。有生以來從未看過如此淒慘的景像，那血流到圓環旁邊的水溝，我整個人被嚇到，那天根本吃不下飯。

後來，因為家業沒落，同時又遇到七七事變，遷移到現在的青年路租屋。戰後，父親回臺後找到日產房屋，從仁德國小宿舍再遷移到民生路侯全成醫院隔壁。²²二二八事件後，我親眼看到一幕景象——當時大家都很緊張，因為國軍開始殺人。聽說：湯德章與侯全成在臺南市議會共同領導工作，侯全成見勢不妙怕被究罪，竟反叛臺灣人民們，私自用卡車運一堆罐頭食品給那些「國軍」補給，這是他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。因侯全成曾協助逮捕二二八起義民眾²³霸氣不可一世，當時民間稱他為副市長。他雇用臺南姜姓等兩位司機，用兩輛卡車運載補給食品到臺南機場支援；包括避難的外省人。湯德章慷慨從容面不改色就義！而變節臺奸侯全成却得以如願免於一死！

後人解讀臺南在二二八中，為什麼沒有死很多人？第一，湯德章把他手上握有二二八的相關名單資料都燒掉了；第二，因為侯全成背叛人民支援「國軍」，以行動表態順從中國人，所以臺南沒有武裝反抗，鎮壓情勢也比較和緩。第二種說法可以參考林啓旭在1983年於東京大學撰寫，由「新臺政論雜誌社」所出版的《臺灣二二八事件綜合研究》。另有《被出賣的臺灣》一書，美國駐臺灣副領事George. H. Kent著，前衛出版社出版發行。

〔附註〕1947年二二八受難者李來基遺詩：「鳥兒，像告訴什麼似的，在春空中飛鳴！遠遠的汽笛留下幾道餘韻，像吞沒無數的憂愁！難道生命是塵埃？愛情是沙土呢？拭淚吧！為了至愛的被壓迫的同胞，春風微微像柔忽的歌唱，在歡送我們光榮的滅亡。」

標工程：幫錢莊開闢財源

我在建設局約做了兩年就離開，轉到長成營造廠。那是同學的爸爸開的，他常到市政府標工程，且聽從同學的爸爸勸我：「你還年輕，要出去實際工作、學經驗，在裡面沒有前途可言」一言，就私自決定；不經提出辭職書，擅自離開工作崗位不上班了，那是二二八之後的事情。

21 根據南部防衛司令部公布的罪狀，湯德章的日文名字應為「坂本德章」。

22 侯全成當時是醫師公會的理事長。

23 參閱史明，《臺灣人四百年史》，二二八欄，頁812。

當時是地下錢莊非常流行的時代，中小企業如果要融資，向銀行貸不到錢，只有向地下錢莊借貸融資一途。因為當時銀行都由中國人掌管，除非有特殊關係，一般老百姓談不上夠格去借錢，市場上自然興起地下錢莊。臺北最有名的地下錢莊為「七洋貿易行」，²⁴臺南的地下錢莊也有一家，老闆是在臺南永福路（在臺銀旁邊）做冬瓜出口商的老闆叫陳麗水。²⁵那家錢莊需要資金來源，想到標工程這條捷徑，於是就找上了學土木、在東京留學過、曾經待過市政府的同事，請他去主持投標工程。爾後將我從長成營造廠挖角到「三進營造廠」去幫他忙，於是先去借一張甲級營造廠牌照，當時如持有一張甲級牌照，所有大小工程都有資格可以投標。我在市政府實際工作過，學過監工、繪圖、寫發包的施工說明書、編製工程預算書、估價等工作。招標都是建築工程為多，他叫我當工程實際領導人，每天到處去領標，今天領工程圖回來，估算到半夜，隔天一大早就坐火車去投標；當年縱貫鐵路，火車上經常都是擠滿了人，幾乎沒地方站，有的人甚至爬到車頂上去，不肯下來。有時我是從窗口爬進去後，找個地方睡，或只能躲到木板椅子底下補眠。

那時我標到很多工程，包括虎尾機場、岡山空軍軍官學校、左營的海軍陸戰隊營舍、屏東機場、佳冬機場等。承包工程後再分包給木匠、泥匠，水電和油漆等工頭，再由承包工頭分別召募工人。所有的物料都由我來訂貨，即時送到工地，木料甚至要遠到豐原去訂購。我光是標工程就已經忙得頭暈腦脹，又要確保完工期限，所以日以繼夜奔波、常搞得筋疲力竭。

在岡山官校進行校舍修復工程時，曾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怪事。有一天在工地工作中的營造廠同事，全都被官校的人關到營內碉堡。他們只好打電話回營造廠求救，說他們被關在碉堡裡，要老闆趕快拿錢過來。到底要老闆拿多少錢，他不敢說出去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但這件事讓我知道中國人非常野蠻凶狠，要拿紅包竟然用這種方法，單純的工程案卻必須送錢給他們才答應放人，否則無法繼續進行承包工程，此等土匪行為真令人不齒！（待續）

24 「七洋貿易行」於1949年4月9日被陳誠查封。

25 根據《不堪回首戒嚴路：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展》小冊子中的死亡槍決名單，籍設臺南市、時年27歲的陳麗水，於1953年5月26日被槍決。

